

一切诚念终将相遇

——解读王元化 钱钢/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一切诚念终将相遇

——解读王元化 钱钢/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钱钢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ISBN 7-5351-3481-5

I. —… II. 钱… III. 王元化—人物评论—文集
IV. G825.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034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438000 · 黄冈市八一路 9 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4 插页 14.5 印张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5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481-5/G · 2804

定价:26.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写在前面

曾见王元化先生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李锐先生相赠的手书条幅，抄录了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先生显然很珍爱这幅字。行己在怀，孤往精进，得老友相契于心的理解与勉励，先生心中之悲喜，他人或不能尽悉。

然而，一切诚念终当相遇。王先生是性情中人，他的学殖修养使他能够沉浸于孤寂的个人思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但因着个性他又不喜欢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而乐意与朋友坐而论道，交流看法，从思想到学问，到时事，到情趣。对于他人的评论，先生倒不在意赞成还是反对，而看重别人是否能读懂他，能否理解他谈的问题。钱谷融先生在文章中称王先生“既英锐而沉潜，既激烈而又雍容”；又称王先生有伯夷之隘而无柳下惠之不恭，意谓王先生虽然品行高洁，但是眼中揉不得沙子，不能以淡然无谓之心面对滔滔浊世。王先生读后说：“钱先生这篇文章对我的评价和批评，切中肯綮。”张隆溪读了王先生的文章，写信来谈了自己的一些不同

看法，王先生认为有助于进一步探讨问题，便推荐至报刊发表。张汝伦在写评论前曾与王生长谈数小时，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上他们有过激烈的争论。

这种交流的真精神，钱谷融作为王先生的多年知交，看得明白：他从不说自己绝对正确，也真诚地欢迎别人来商榷，但在骨子里则十分自信，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主张确实站不住，否则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又常常对自己的学术见解不断作出深刻的反省，一旦发现有疏漏或缺失，或是他人对自己有所启发或帮助，总要公开说明，并对自己的意见作出修正。如此既坚持己见又能虚己服善，我想其内在还是一种诚念，对于真知的诚念。因为大家只关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坚持己见不是为了逞强好胜，虚己服善只是服从合理有效的观点，如果观点相洽那是面对问题殊途而同归，分歧争议则更有深一层反思与磨合的诱引。而这不仅是王先生的著作对于读者的吸引之一，也是我们编纂本书的乐趣所在。

南方朔的文章要言不烦地重新托起了“读书人”这三个字的分量。文章以与世俱迁的浪花顶上的灿烂和沉潜自在的大海本身这两类意象区别两类读书人，推许王先生为陈寅恪那样的“第二类读书人”。作者从一本散文之集腋的《清园夜读》中，看到了王先生的人文关怀、思想和学术功力，这些被涵容于“通儒型思想人物”的“用功”之中，如此才能生成沉潜自在的大海本身。返观当今学界，读书人更多是受着“机

“会成本”意识的牵引，纠缠于名利，所以越来越多的还不仅是在“术业有专攻”的名义下窄化学问，不问思想，更有一些浮躁之极的“另类读书人”，不惮胡说八道以耸动视听。即使像胡适那样的“第一类读书人”眼下也是求之已稀，遑论王先生一再阐扬的熊十力老人的读书八字诀“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难怪先生近年对于学界的风气时有失望和殷忧。再想想王浩先生的那句话，“现在的读书人太容易有名了”，语气有些怪异，这与其说是对着“现在的读书人”，不如说是对着现在读书人社群的“典范危机”，即对着读书的意义之被瓦解或异化。如此看来，南方朔的文章，以及不少论者对于王元化先生之为人为学为文的钦敬之意，啻啻是对一种愈见稀罕的学术典范的礼赞与呼唤，这也应是我们解读王先生的意义之一。

如果说南方朔的文章揭橥了王先生的学术风范，那么胡伟希、胡晓明、谢志浩、张汝伦、单世联以及魏承思、李庆、吴俊等人的文章，都意在解读王先生九十年代反思的思想脉络。这是王先生的思想历程进入新境界的高峰时期，也是他被人较多误解的时期。王先生自己曾说他的反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自觉，可能是由于思想受到生活的冲击，才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论者也多注意到这点，所以常常将王先生的经历、行宜和他的文章联系起来理解，称之为“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体现了“思想与德行的互化”。这里应特别注意反思在王先生的意义，因为他的反思常常是以一种自

我审查的方式进入到问题之中，他自己则曾引鲁迅所说的“剖心自食”自况。这对人的德行显然有所要求，要很真诚地重新考量自己曾经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坚持独立思考，同时还要克服一般年长者很可能会有的思想上的堕怠之习。对王先生的反思张汝伦从西方哲学的角度予以认同；吴俊则看到，王先生的反思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还有其特殊的情景和相似的印照。我想这背后还有一个知识和信仰的背景，包括基督教的家教背景，传统文化的私淑授受，但最主要的应是王先生青年时期浸染很深的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萧乾老人非常推许王先生研习欧洲文学的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语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称许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尤其作者自幼心仪并为之受难过的罗曼·罗兰，其论述的深度要远超出一般文学史家。”王先生自己也说过：“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某种意义上说，王先生后来的反思始终是与这一传统在进行对话。这一传统的核心精神，王先生概括为：“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这决定了王先生的反思不可能是纯思辨的，而必定要将个人的知情意渗透其中，带有人情与人性的色彩，并因而对有悖于人情人性的任何一种僵化的模式保持着警惕。

由此还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应在怎样的层次把握王先生多次面临的思想上的冲突？比如王先生对于黑格尔的反思，在他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思想过程。细读黑格尔，曾使王先

生的理论良知得以发明，并升至渣滓尽去、清光大来的思辨境界。反思黑格尔，最终否定了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和逻辑历史统一说等等，思想进入了新的境界，但他并没有因此将黑格尔当做一条死狗完全抛开，相反，他的理论阐述至今仍有黑格尔哲学的影子（当然是经过清算的黑格尔哲学），像对于卢梭思想的理解，对于道德继承问题的分析等。我想强调的是，与生活激发思想同样重要的是，王先生始终将思想冲突控制于对话的层面上，既与他人的不同观点建立起对话，也在自己精神的内部建立起对话，如此才有谢志浩所说的“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进行着深入的反思”。而思想上的对话规则的反面，正是激进主义那种偏激、狂热、好走极端的思想暴力，是王先生极为反感的。根据法国当代思想家莫兰的描述，当对立思想在同一个人的精神中相互斗争时，这些思想或者会相互抵消，进而让位给怀疑；或者造成个人的精神危机，并刺激反思，引发对新的解决方法的探索；或者引起对立思想的创造性综合。这三种情形在王先生的思想中似乎都存在。像王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知性、公意、意图伦理的独到见解，都可以由这一思路去解读。而且恰恰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王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

林其谈先生对我说，只有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王先生思想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就本书所收而言，单世联的文章多少体现了一种在思想史上进行比较

的思路。单文在“告别黑格尔”的主题下,将王先生的思想与张中晓、李泽厚、顾准的思想加以比较,这作为“解读王元化”这一学术视野的一种衍展,如果随意删去对另外三位的论述,反而会有损于对王元化与黑格尔这一题目的理解。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单文能体察到王先生的论证细节,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王先生对知性问题的创见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的意义,尽管单对此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单文指出,王先生通过揭示知性思维的弊端,从而对文革及其他一些左的思维方式加以定性,因而有功于中国的思想解放。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知性重“分”的精神也符合科学精神,所以仅仅批判知性方法并不能清理极左专制的思想根源,而应进一步去清理黑格尔历史总体的理性主义。其实胡伟希和张汝伦的文章就特别注意到王先生对于黑格尔同一哲学的清算。记得顾准和牟宗三都说过中国人缺乏知性思维之类的话,他们从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知性多有肯定。王先生也曾在《知性不能掌握美》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知性作为分析的理智所具有的作用,不仅在自然科学上,甚至也在文艺研究中。他后来论述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时,将传统道德的“根本精神”与其“派生条件”区别开来,就运用了知性的分析方法。但是同时,王先生将拘囿于知性作为极左思想的认识基础来思考,敏锐地觉察到,极左思维因不能区别知性与理性,虽然自以为据理性以行动,实际上却僵滞于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等特点的知性状态,像“抓要害”(即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三突出”等等提法

因而显出其荒唐与专横。这些确系王先生的创见。但这主要不是如单文所说，因为他与李泽厚一样由美学进入历史，至少有两点我觉得更为重要。第一，王先生对知性问题的领悟，同样是与他对现实的省察联在一起的，其中包括他对自己过去一些理念的反思与超越。第二，与其说由美学切入，倒不如说是因为王先生的思考始终以人为核心，因为知性思维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有一层智识障碍。王先生研究文艺和美学，关注的是人，所以他那本《文学沉思录》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而他进入九十年代的反思，如前所述，对人的关注也始终不渝。惟其如此，王先生对于知性问题的省察，至今仍体现于他的思考之中，尤其体现在他的一些具体的现实或文化问题的分析之中。而一些人对他的误解，似乎也由于至今没有从思想方法上理解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至今仍在用王先生早已清算过的知性方法去看待他的理性分析，自然不得要领，而王先生却因此能将他们的缺陷看得一清二楚。

樊百华的那篇长文非常强调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中解读清园主人，并且确实是带着现实中的种种疑虑，迈过了清园的门槛，进去实实在在地用心看了一番，得出了自己对于王先生思想的把握，那就是四个字：“崇尚自由”。“初入清园”的收获此处不赘，我所感兴趣的是作者与王先生在思想上的冲突，焦点是如何看待激进主义，而樊则要为激进主义作一番辩护。其实，樊文强调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评价激进主

义,这本来也是王先生思考此一问题的激发因素,但是王先生还有两个维度在他也很重要,那就是历史的维度和理论的维度。樊文说王先生反思的路数是由批左上溯至反思五四与卢梭,已经触及到王先生思想的历史维度。如果将《九十年代日记》中王先生对于戊戌新政的看法也置于视线,再加上他几次言及明清之际的王学左派对于后人的影响,则王先生对于激进主义思潮之历史维度的反思就很明显了。就理论维度而言,胡伟希的文章就明确地从反思黑格尔的同一哲学到反对激进主义之间,看到了王先生的一条思想走向。而樊百华则不能看到,王先生的反思不单是受到现实的激发,实在还有某种理论的导向,尽管这种理论导向也是他历验世务之所得。可以说王先生是在一个非常理性而冷静的深层次上,从现实、历史、理论三个维度,将五四、公意、意图伦理、激进主义等等纳入自己的问题意识的。细细体会这里也流淌着激情,但那是在理性而冷静的深层爆发的激情,那才真的有力量。这一点樊百华似乎看不到。而林贤治因此誉议王先生跟风,更是枘榫不接,莫名其妙了。

谢志浩的文章将王先生与同一辈的贤达之士进行比较,由此去体会王先生的孤往与卓立。像王元化与钱钟书、与李慎之等人的异同,与孙冶方、顾准在精神上的一脉相通,所言都颇能给人启发。尤其是王先生与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分歧,人们不明所以,谢文则将此与人们同样不太理解的一个问题,即王先生何以由主编《新启蒙》转而主编《学术集林》,联

系起来看,认为关键在于王先生的反思最终清算到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终能在短时间里进行了思维的自觉转换。我想加上一句,这种转换早在王先生关注知性问题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学术集林》至今出了十七卷,历时八年了,海内外学界多有好评,然而王先生不辞辛劳亲自主编《学术集林》的深意,第一次由谢文予以发明。(据笔者所知,《学术集林》的不少稿子由王先生亲自审定,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人很疲倦。)由此还想到王先生在《学术集林》第一卷“编后记”中所标举的办刊宗旨,即“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句话不少人引用过,但未必能体悟到此中所揭露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是王先生沉潜反思所得之特识,其中有对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敲响的警钟,有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读读王先生写的《学术集林》的那些“编后记”,对此也不难有所领悟。

有人曾感慨王先生写的东西偏杂,如果再集中一点影响就更大了。但这些年来我越来越体会到,王先生既看不起偏识寡悟,但也不主张汗漫博求,而讲究追根穷源。从拈出知性问题,到质疑“具体的普遍性”,再到批判意图伦理,分析公意说,最终清算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条线索其实非常集中而明显,越来越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王先生顶真、审慎几近苛刻,用谢志浩的话说,“心思用到呕心沥血的程度”。一个问题不从根源上整理清楚,他不会善罢甘休;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决不妄下论断。在这一过程中,王先生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训练的理性思辨能力,和他平时以开放心态积

累起来的极为丰富的“支援意识”，一起发挥了作用。

二十几岁就出版了第一本文集《文艺漫谈》，而现在人们关注的多是他六十岁以来的学术和思想成果。有人说他“老来红”，有人说他“大器晚成”，这背后所凝聚的整整一代学人痛苦的心路历程，王元化先生以他不屈的人格扛了起来。作为读者，作为后学，我们心中的感怀，又怎能以三言两语道出？

从已有的那些解读或评论某人的书籍看，或以存文，则遴选当然要求精粹；或以传意，则选文不求完备，可作摘录，但往往分别类目以便利阅读和翻检。为了既有重点又能较全面地反映解读王元化先生的已有成果，本书的第一部分和后面几部分正因此而有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摘录的文章一定不够存文的价值。其实原先全文选入的文章要大多大于现在的，只是考虑将一本解读类书籍编得太厚重，反而不利阅读，于是对很多佳作只能采取摘录的形式。另外海外还有一些非华语类著作文章谈到王先生，像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莉娜·唐布利诺(Lina Tamburino)所著《龙》(Dragon)一书，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所发表的希拉·迈尔雯(Sheld Melvin)的文章《有良知的改革者》(A Reformer with a Conscience)，以及法国《人道报》记者对王先生的采访评论等，这些外国语文字本书则不予收入。

第一部分全文收入文章的十位作者中，钱仲联、蒋孔阳

(已故)、钱谷融是王先生的老友，胡晓明为及门弟子，张汝伦是忘年朋友，而其余五位与王先生都并不相识，王杏庆(“南方朔”系其笔名)则是王先生后来访问台湾时才得以谋面。

第二部分为纪事，意在为解读王先生提供一些具体的“认知背景”，其中李子云、朱微明、彭小莲、江增培、晓光、周新等几篇都值得推荐。

第三部分为专题评论。其中劳承万的文章曾收入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分量颇重，但考虑劳文所论为王先生九十年代反思以前的学术思想，故而作为摘录。吴俊的文章发表时也是作为刊物的重点，笔者主要删去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另外像钱伯城、魏承思、包遵信、许纪霖、李庆、海旸、一德等不少人的文章，同样均由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而对王先生之思想与学术有过各自深切的“凝视”，现在也都只能择其精要。

第四部分为涉及评议。比起前一部分，这一部分往往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扫描”，内含不少比较，读者有兴趣找来原文阅读或许能加深理解。像徐铸成谈王元化一段，前后还谈到对其他文化界人士的看法。为了不游离本书主题，也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将这些“扫描”定格于王先生。

第五部分为援引，其实作为一种选择，自然也反映了援引者某种评价。

第六部分为附录。著述目录和评说文章的总目尽可能收到本书截稿为止。其中“专访”一类收入那些记叙和评论王先生的行谊和思想的文章，那些或可收入王先生文集的访

谈文章则不在其列。

感谢陆晓光兄、我的表哥吴释和我的学生吕晨，以及姚芳藻、徐复仑等先生，在资料的查找和整理上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编者谨识

目 录

写在前面/1

第一部分 综论

钱谷融 谈王元化/3

南方朔 第二类读书人/14

胡伟希 在思想与德性互化的每一瞬间/16

钱仲联 《文心雕龙创作论》读后隅见/22

蒋孔阳 翻译与研究的结合——读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33

胡晓明 当代思想史的脚注/41

谢志浩 有学问的思想家——从《九十年代日记》体会先生/45

张汝伦 拔地苍松有远声——读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

和《九十年代日记》/64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73

樊百华 初入清园/117

胡晓明 一切诚念终当相遇/169

第二部分 记事

吴初六 《万人小说》琐谈/181

- 尚 丁 黎明前夜空的一颗彗星——《展望》史事录/182
陈丹燕 缠绵了半个世纪的情感——王元化与张可/183
宋连庠 赵朴初的翰墨缘/184
王大象 新文艺出版社纪事/185
朱微明 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187
彭小莲 他们的岁月/190
万承厚 《存斋随笔》跋/191
李子云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192
左 泥 读《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有感/204
余秋雨 长者/207
蒋述卓 识佳文于未振——郭绍虞与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写作/213
牟世金 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15
吴 岩 清园与竹/215
于光远 朋友们的书/216
丁 东 长者的风范/217
晓 光 我所知道的《新启蒙》论丛/219
江曾培 沉潜在思辨海洋中的王元化/226
高国平 关于《思辨随笔》的随笔/229
李 潘 清园：来自岁月的记忆/233
周 新 湖畔居的那一片夕阳——王元化先生印象记/234
张光年 沪苏日记/239
鲁枢元 《文艺心理阐释》后记/240
吴洪森 《形象的爱情心理学》附注/240